

论堪舆符号的理据性与理据性上升过程

王雨馨

(四川大学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堪舆是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携带着丰富的意义,本文以研究意义的符号学为切入点,分析堪舆文化符号与对象之间的理据性,包括像似性和指示性。堪舆文化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最初堪舆是先民们对于环境选择的经验总结,后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信仰,堪舆符号的理据性在符号被使用的过程中逐渐上升。本文根据堪舆文化的发展史,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堪舆文化的不同状态,分析堪舆符号理据性上升的过程和促进因素,其中符号伴随文本的增加和假托附会现象是最突出的两个因素。

[关键词]堪舆;符号学;理据性;理据性上升

[中图分类号] B9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19)04-0088-06

一、引言

堪舆文化是源于中国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堪舆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术数的一个门类,属于相地之术,也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术数推演,选择适宜营建阳宅或阴宅的吉地。实际上术数远非堪舆文化的全部,术数的目的在于推知祸福、趋吉避凶,而堪舆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环境选择的理论,凝聚着中国人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自然观、地理观和环境观。在这些理论基础之上,才是通过阴阳、五行、八卦、四象、天干地支等符号系统衍生出的各种术数占法。目前学界针对堪舆文化的研究成果众多,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但这些研究绝大部分关注的是堪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或是堪舆文化的实践价值,极少关注堪舆文化本身的表意问题。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堪舆文化携带着丰富的意义,而符号学正是研究意义的学说,本文从符号学角度出发研究堪舆文化符号的理据性,并通过堪舆漫长的发展史,探讨这套文化符号理据性上升的过程及促进因素。

二、堪舆符号的理据性

理据性是针对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指的是符号与对象之间存在某种“‘本有的’连接”,^①皮尔斯根据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将符号分为了三类: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规约符号(symbol)，“三种符号的所谓基础(ground)即存在理由,也就是符号与对象的连接理据性,也广为人知,即为‘像似性’(iconicity)、“指示性”(indexicality)和‘规约性’(conventionality)”。^②三种符号中,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是有理据性的符号,相应的,符号的理据性也就具体体现为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像似性和指示性。

(一)像似性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制度史·宫室篇》中提道:“风水之始,避风及水而已。”^③可见堪舆符号系统起源之初并不是一种术数,而是上古先民选择自己适宜的居住和墓葬环境的经验总结。最初的堪舆符号相当原始,就是先民们触目所及的自然环境,属于自然符号、无发送符号,“自然符号携带的文本意义,完全来自接受者对其进行符号化”,^④而“符号化的第一步实际上是比拟模仿”,^⑤许多堪舆符号都是像似符号。皮尔斯将符号的像似性进行了三分,分别是形象式像似、图像式像似和比喻式像似。在堪舆符号当中,形象式像似与比喻式像似比较明显,

形象式像是图形上的比拟模仿,具有一种“再现透明性”,比喻式像似则比较抽象地再现了对象的某些特质。

堪輿符号中有很有一部分由地理环境、地形地貌的形状模仿而来,尤其堪輿中的形势派堪輿符号最有代表性。形势派是堪輿的重要流派,这一派主张根据观察地形地势来选择居住环境和墓葬地址,在堪輿实践活动中讲究运用“地理五诀”,也就是周遭环境龙、穴、砂、水、向五大要素的配合。其中“龙”指的是龙脉,也就是“地表连绵起伏,地中生气相贯通的山脉”,^⑥“龙”这个符号与其对象——山脉之间具有像似性,山脉在地表呈现连绵起伏之势,形似一条俯卧在地面上的龙,同时堪輿理论认为山脉之中蕴藏有“生气”,“夫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⑦生气在山脉中奔涌,因地势起伏而有强有弱,正如龙的运动姿态。于是根据山脉形状的不同,堪輿符号中也有不同的符号对其进行描绘,比如在《管氏地理指蒙》中,提到了九种龙脉的形式,分别是“蟠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腾龙、领群龙”。^⑧显然,这样一组符号描绘不同山脉的形象,像似性特征十分突出。“穴”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文提到,在堪輿符号系统中,“龙”这个符号指的是生气运行的轨迹,“穴”这个符号指的则是生气出露之地,“穴”地往往背山面水,左右山形呈环抱之势,之所以能有生气涌出,是因为“穴”地是阴阳二气交汇之所,“穴”是理想的丧葬之地,因为“古人认为,人的诞生和死者的转胎都是通过女阴来实现的”,^⑨安葬在“穴”地能够借助此处产生的旺盛的生气达到荫蔽后世子孙的目的。由“穴”的功用再联系诸多堪輿论著中绘制的穴形图,我们能够意会到所谓山脉之中潜藏的“穴”其实是人体女阴的象形,是远古生殖崇拜的遗留。

由以上两个例子我们能够发现,堪輿符号的像似性是十分显著的,形象式像似与比喻式像似在堪輿符号中都有体现。山脉与龙、“穴”与女阴外形上的像似,是符号对对象的形态进行描摹的结果,是形象式的像似;而地表生气奔涌之势与龙的动势、“穴”地阴阳交汇与生殖崇拜,则是相对抽象的比喻

式像似,再现了对象的某种特质。

(二)指示性

除了像似性,堪輿符号的理据性还表现在它的指示性上。“指示性,是符号与对象因为某种关系——尤其是因果、邻接、部分和整体等关系——因而能互相提示,让接收者能想到其对象,指示符号的作用,就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上。”^⑩“指示符号是最基本的和最原始的,而带矢量指示符号可能更为基本。”^⑪堪輿符号当中有一系列这样带矢量的指示符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方位指示符号。

赵毅衡教授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提到了自然符号的弱编码特点,因其意义的解释比较模糊,产生歧解的可能性比较大,因而指示性是比较弱的。正如上文所述,起初堪輿符号是自然符号、无发送符号,其发送意图和文本意图要靠解释者反向构筑。为了能够更有效地选择适宜的居所或者葬地,通过揣测“天意”来推知所择之地的吉凶祸福,堪輿符号在发展过程中引入了许多指示方位的符号。

堪輿符号中指示方位的符号不只有基础的东、南、西、北,还有四灵、星宿分野、八卦九宫等。所谓“四灵”指的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形象,上古先民观察星象,将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分为东、西、南、北四方星座,根据星座形状演绎成这四种具有灵性的动物,各自掌管一方: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据古代地理著作《三辅黄图》记载:“天之四灵,以正四方。”^⑫这“四灵”被运用到堪輿符号之中,并最终成为堪輿符号系统中指示方向的符号。

“四灵”指示符号运用于宏观的堪輿实践活动,用来指示大的方向,然而堪輿活动并不局限于纯自然环境之中,伴随着堪輿符号系统的发展,方位指示符号可以细化到每一间宅院当中,这里要提到的就是“八卦九宫”。“八卦九宫”指的是将住宅内部的方位与文王八卦的方位联系在一起,在文王八卦当中,东方为震卦,西方为兑卦,南方为坎卦,北方为离卦,东北为巽卦,西北为坤卦,东南为艮卦,西南为乾卦。将这八个方向的指示符号应用在堪輿当

中,再加上中间方位,形成“九宫”,这“九宫”也就是指示宅院内部方向的指示符号。

指示符号的重要作用在于“给对象以一定的组合秩序”,^⑩堪輿符号中不仅有方位指示符号,还有另外一些时间指示符号,这些指示符号最重要的作用是形成组合秩序,首先要明确这些符号指向的具体对象,也就是环境方向和时间顺序,对这些对象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堪輿实践活动。许多堪輿师在进行堪輿操作时,会根据这些方位和时间指示符号与周围的地形地势及人的命理等因素进行匹配,以此推测所谓的吉凶祸福,所以这些指示符号犹如齿轮,形成了组合秩序,推动一整套堪輿符号应用于实践活动,是堪輿具有可操作性的重要条件。

三、堪輿符号理据性上升

正如上文提到的,堪輿文化最初是上古先民择地的经验总结,但我们如今谈起堪輿,能够联想到的不仅有中国传统的地理、环境知识,更多的是关于周遭环境、住宅、方位等因素与人的吉凶祸福的复杂关系。那么堪輿符号究竟是如何由弱理据性的自然符号,演变成为让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命运影响因素的呢?人们又为何会相信堪輿实践活动能够影响到人生际遇呢?显然堪輿符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理据性上升的过程,由实践经验上升到一种“社会信仰”,化为“隐匿之物藏于人们的内心结构之中,早已经成为一个集体的符号”。^⑪在堪輿符号理据性上升的过程中,伴随文本增加和假托附会两种现象起到了促进作用,是理据性上升的重要促进因素,这两种现象的发生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合力的结果。

(一)增加伴随文本

除了符号本身的理据性之外,符号“只要被社群用入符号交流行为,就获得再度理据化”。^⑫也就是说符号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理据性会有所上升,这主要是因为文本间性增加使理据性增强,文本间性使符号“可以从别的文本中借来意义,从而使使得自身的理据性有所上升”。^⑬所有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相结合的,符号文本与伴随文本之间存在着文本间性,堪輿这套符号文本也不例外,对于

符号文本来说,伴随文本是文本与其所处的广阔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纽带。堪輿符号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有明显的伴随文本增加的现象,增加进符号系统的伴随文本大多属于“前文本”,指的是同一文化背景下,先前产生的文本对现有的文本造成的影响,我们通过分析堪輿符号的发展历程能够清楚地看到前文本增加的过程。

原始的居住形式经历了穴居、巢居、半穴居、地面建筑等形式,那个时代的先民们已经具有一定的择居经验,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中,已经呈现出了选择适宜环境居住的现象,比如民居大多靠近水源,位于河流交叉处,选择向阳的山坡等,这样能够得到充足的水源和光照,并享受便利的交通条件。到了商周时期,先民们因为笃信“万物有灵”而不再单纯依靠自然择地,而是开始利用占卜预测所择之地的吉凶,但占卜择地的形式首先是将人们选择好的地点通过甲骨契刻“敬告上天”,而后获得此地是吉是凶的结论,而选择地点依然依靠的是人的择地经验。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现状催生百家争鸣,中国传统哲学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个阶段是堪輿理论发展的准备期,许多后来被引入堪輿符号系统的符号,比如“五行生克”和“精气论”都产生于这个时期。“五行”理论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⑭这里只认为“五行”是事件五种基础物质,尚未获得抽象意义。而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在“五行”学说基础上发展出了“五行生克”理论,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在此基础上邹衍又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五行此时“成为了某种天意的预兆,预示着未来新朝代的兴起,而不再是《洪范》中表示的五种物质了”。^⑮在战国时期,托名管仲的地理学著作《管子》中提出了“水者,地之血气”的观点,^⑯并认为不同地区的水质与当地人的性情有关系;另外,春秋时期产生了坟丘式墓葬,这与上古不封不树的丧葬模式非常不同,坟丘形式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十分普及,人们为

阴宅选择合适地理位置的思想也在此时逐渐萌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理论准备,是后世堪輿符号的前文本。

到了秦汉时期,堪輿理论得到了极大发展,堪輿符号文本的伴随文本增加现象十分明显,上文提到的“五行”“五行生克”和“五德终始”都是在这个时期被引用到堪輿符号体系之中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阴阳五行生克制化。”^⑧易学象数理论在汉代得到极大发展,这是学术潮流也是社会风气,汉儒董仲舒将各类事物与阴阳五行结合起来,并加入“天人感应”的观念,将五行赋以五德,进一步发展了邹衍等阴阳家的理论。在此推动之下,堪輿理论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摆脱单纯禁忌形态,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开始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历史进程”。^⑨五行八卦应用到堪輿符号之中主要用来指示方位和时间,早在周代人们已经有用八卦表示八个方位的思维雏形,到了汉代发展为用乾(西北)、坤(西南)、艮(东北)、巽(东南)这四维,同八天干(十天干中除去戊、己)、十二地支一起来表示二十四方位,这一点在后世堪輿罗盘上体现为“二十四山向”。上文提到的以四象指示四方、以八卦指示宅院的八个方位也都是沿着这个思路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而来的。同时汉代学者还发展出了十二地支记时的方法,并将八卦与十天干联系起来,“以震兑乾巽艮坤六卦表示一月中阴阳之消长,以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十干表示一月中日月的位移”,^⑩被称为“纳甲说”。在汉代堪輿符号的理据性因为增加了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理论而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些产生于前代的理论对于这一时期堪輿符号文本而言是前文本。而汉代诞生的两部堪輿理论著作——《堪輿金匱》和《宫宅地形》,虽然都已亡佚,但已经有学者考证出《堪輿金匱》内容偏重于以方位推算吉凶,内容包括汉代流行的六壬术;《宫宅地形》则偏重于以地理形势论吉凶,这二者各有侧重,“后世理气派与形势派的区分大约肇始于此”。^⑪堪輿符号系统的发展历程中,形势派与理气派的分立发生于宋朝时期,对于这两派而言,汉代这两部堪輿著作是它们各自的前文本。

需要说明的是,堪輿符号系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它理据性上升的过程类似于河流汇聚的形态,无数支流在发展历程中汇入堪輿符号的主流,我们如果从漫长历史进程中截出某一时代堪輿符号发展状况的横截面,就能够发现前代的许多理论学说是这一时期堪輿符号的前文本,发展历程越久,堪輿符号越成熟,我们能够发现的前文本也就越多,堪輿符号与文化整体的联系也就越紧密。前文本与符号文本主体之间的文本间性使堪輿符号在使用过程中借助一些现成的理论提升了自身的理据性,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可信度也就增加了。汉代术数的引入包括魏晋时期堪輿广泛地援引佛、道、儒各家理论都是这样的过程,堪輿符号也因此逐渐上升为一种“社会信仰”。

(二)附会与假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堪輿符号的发展除了上文提到的引入儒、佛、道三家思想作为伴随文本,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使用堪輿符号的社会阶层“逐步扩大并不断上移”。^⑫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处于战乱与社会动荡之中,在朝不保夕的生存环境中,趋吉避凶、预知和干预命运就成了人们最大的愿望,加上历代累计下来的堪輿理论的发展,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开始广泛利用堪輿符号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不论是阳宅还是阴宅,择地过程中堪輿符号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一时代还催生了许多堪輿大师,其中最知名的是三国时期的管辂和晋代的郭璞。

正如汉代思想家王充所言:“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后不能不由吉凶。见吉则指以前世择日之福,见凶则以为往日触忌之祸。”^⑬堪輿符号使用如此泛化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会产生将命运吉凶与家宅、祖墓所在地相关联的思想,这是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的附会现象。比如普通大众在接触到堪輿的时候都会了解到的两个知名故事,一是折臂三公的故事,二是卧牛地的故事,它们都出自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史学论著。

“人有相羊祜父墓,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⑭

折臂三公的故事在南朝宋刘义庆主编的《世说

新语》和《晋书·羊祜杜预传》中都有记载,是阴宅堪輿形势的优劣决定子孙命运的经典例子。

“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岗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两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②

牛卧之地的故事记载于《晋书·周访传》,同上一个故事一样,都是魏晋时期阴宅荫庇子孙观念的展现。

诸如此类的堪輿“灵验”故事还有很多,魏晋之前与之后的许多典籍中亦有记载,但魏晋时期这一现象格外突出。人们感知到世事无常,一个人的命运跌宕起伏往往无法解释,将人的旦夕祸福附会于堪輿,有意无意间就是在强化人们对于堪輿符号的依赖感,附会行为正是堪輿符号理据性上升的途径之一。

经历了魏晋时期堪輿理论的发展与普及,到了隋唐时代,堪輿符号系统开始走向成熟,这一时期堪輿理论著作开始大量涌现,逐步完善着堪輿符号系统,经历过魏晋时期堪輿风靡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之后,隋唐时期堪輿继续盛行于朝野,社会地位变得越发重要。唐末堪輿大师杨筠松开创了江西派也就是形势派堪輿,到了宋代,堪輿理论中正式分出上文提到过的形势与理气两派。形势派擅长通过观察地形地势来选择阴宅阳宅,推知吉凶祸福;理气派则擅长通过方位时辰测算进行吉凶推演。这两派上承汉代《宫宅地形》和《堪輿金匱》二书的不同理路,沿着各自的方向逐渐发展完善,其中形势派因为神秘化色彩比较少,实用性更强,所以占据了主流地位。

隋唐以降,堪輿大师珠玉在前,使后世的一些堪輿论著有假托前代人所作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假托晋代郭璞所作的《葬书》。关于《葬书》是伪书的推论由清代学者考据得来,在《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葬书》一卷时有言:“旧本题晋郭璞撰。璞有《尔雅注》,已著录。葬地之说,莫知其所自来。”虽然通观当今存世的《葬书》文笔,“书中词意简质,犹术

士通文义者所作”,但清儒经过考据则认为此书并非出自郭璞之手——“考璞本传,载璞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中书》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为火所焚,不言其尝着《葬书》。《唐志》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又不言为璞所作。惟《宋志》载有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自宋始出,其后方技之家,竞相粉饰,遂有二十篇之多。”^③

从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四库馆臣认为《葬书》产生于宋代,虽然关于其具体的成书年代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其为托名伪作则是主流观点。纵观历代“数术文献,多存在托古命名的现象。纵览历代书志目录,不乏托名黄帝、玄女、青乌子、赤松子等书籍”。^④《葬书》被认为是堪輿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书中细致讲解了关于阴宅择地与福荫后世的一系列理论,这本书托名郭璞的最重要原因在于郭璞的知名度甚高,诸多文献资料当中都记载了郭璞善于堪輿相地之术的事迹。比如《晋书·列传第四十二·郭璞葛洪传》中记载:“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⑤这是对郭璞“高才”的概述,《晋书》中还记载了郭璞择地的两则事迹:“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⑥这两则故事一能说明郭璞善察地理,能够推知水势;二能说明郭璞精于术数推演,甚至有“预知未来”的能力。郭璞相地的诸多故事在《南史》《世说新语》中都有记载,在堪輿师群体与普通民众之间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再加上郭璞生活的魏晋时期正值堪輿理论初步成型、堪輿符号理据性得到大幅提升的时代,郭璞本人已然被后世推为宗师,《葬书》托名于他也就并顺理成章了。

著作托名先师这样的现象在唐宋之后的堪輿

领域并不少见,托名的出发点是为了方便著作本身的流传,堪輿著作托名著名人士的出发点很好理解。这种托名现象在著作产生的时代能够使读者更加相信其内容的合理性,在堪輿符号的发展历程中和附会现象一起助推了理据性的上升。

四、结语

长久以来,人们围绕堪輿文化争论最多的问题莫过于堪輿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实际上,当我们以符号学视角探究堪輿文化时就能发现,堪輿文化符号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意义,它的使用者和解释者众多,发展历程也十分漫长,其中具体的起源和历史中的许多细节如今已难以考证,显然堪輿文化的

性质并不能以科学或非科学来一言蔽之。我们回顾堪輿符号表意系统的发展史,首先能够发现这套符号和对象之间具有理据性,许多堪輿符号具有显著的像似性与指示性。同时堪輿符号在使用过程中也经历了理据性上升的过程,人们将堪輿与人的祸福吉凶相附会,或是历史中的佚名堪輿师将著作托名于前辈学者,这二者都促进了堪輿符号理据性的上升,使其最终成为一种“社会信仰”。本文在论及堪輿符号理据性与理据性上升问题时,选择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堪輿符号中更加纷繁复杂的内容还需要我们继续去挖掘和研究。

[注 释]

- ①④⑤⑩⑬⑮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76页、55页、55页、80页、81页、242页。
- ②⑪赵毅衡:《指示性是符号的第一性》,《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04~113页。
- ③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 ⑥⑨⑫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4页、20页、38页。
- ⑦《葬书·明钞宅葬书十一种本》,《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子部术数类021》,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 ⑧管轶:《管氏地理指蒙》,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46页。
- ⑫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 ⑭黎世珍:《论河图洛书作为一种元符号》,《符号与传媒》,2017年第15期,第129~137页。
- ⑯兰兴:《从天地到人伦——四柱禄命中的符号及其理据性上升》,《符号与传媒》,2012年第5期,第107~114页。
- ⑰李民、王健译注:《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页。
- ⑱Lan Xing: The Early Semiosis of Five Phases by Zou Yan,《符号与传媒》,2018年第16期,第227~237页。
- ⑲房玄龄注、刘绩补注:《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页。
- ⑳㉑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14页、921页。
- ㉒张齐明:《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241页。
- ㉓傅洪光:《中国风水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 ㉔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页。
- ㉕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77页。
- ㉖㉗㉘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86页、1899页、1909页。
- ㉙余格格:《郭璞〈葬书〉伪书考》,《浙江学刊》,2016年第5期,第66~77页。